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二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的哲学论战

（三）

主编 钟离蒙 杨风麟

一九八四年六月

沈阳

目 录

思想方法论·····	上礼锡(1)
两个思想方法的对照·····	王灵皋(8)
形式论理与辩证法·····	范寿康(35)
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陈范予(40)
思维方法论·····	张栗原(56)
自然科学与辩证法·····	张栗原(66)
辩证法与形式逻辑·····	李石岑(71)
逻辑与辩证逻辑·····	牟宗三(77)
形式逻辑与马克思方法论·····	吴惠人(98)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比较·····	张凤阁(109)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辩证观点·····	张凤阁(115)
黑格尔与马克思之辩证法·····	张抱横(125)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	实 敏(131)
均衡律与矛盾律·····	亦 英(136)
认识论中之形式论理与矛盾论理·····	亦 英(139)
论矛盾诸规律·····	亦 英(143)
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	白亦民(147)
拥护真理·····	王特夫(155)
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的意义与特质·····	常 师(159)
辩证法本身是辩证的么? ·····	孙道升(164)
辩证法与唯物史观·····	魏嗣奎(166)
唯物史观分析及批评·····	施友忠(173)
唯物史观与经济结构·····	牟宗三(176)
阶级问题·····	东 荪(193)
张东荪道德哲学批判·····	叶 青(201)
道德学是什么? ·····	如 松(230)
进化论与轮化论·····	叶 青(232)
给青年(一) ·····	叶 青(234)
给青年(二) ·····	叶 青(238)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	冯友兰(243)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	张季同(245)

思想方法论

实验主义思维术，形式逻辑，科学的辩证法

王 礼 锡

一

老生常谈式的《苦学与深思》的一篇文章，竟然会发生反响与责难，于是我乐于来为那篇文章的分支——“深思”的一方面。

在某刊物上蒙一位盲马先生，在《苦学与深思》发生八个月之后，与文章发表的不同的环境当中，发掘出来批评，置于戴季陶的同列，加以“麻醉青年”的大罪。另外一位大概与盲马先生同行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大致其不满，尤其不满于我的“要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解答，行动才不会错误”的话，以为这是学院派的理论，这是取消了革命。诚如这两位先生所言，则我这篇论思想方法的文章又是学院派的，又是取消了革命，又是在麻醉青年了。所以首先希望青年们的眼睛在这里顿住一下，如果真是会生出这样的影响，这篇文章千万不必看，它是会麻醉你们的，它是会“取消”你们革命的前途的。不幸，革命成功的祖宗一列宁，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中国托罗斯灰派份子退出他们的党的时候，谁都是在告同志书或致中委书中，指摘其在理论上的错误，尤其是李季对于他们误解中国社会加以严厉的质问。就他们现在还一直保持着的所谓“反立三路线”，也是主要的指摘其对于中国经济问题，革命高潮问题理解的错误。以盲马先生的眼光来论断，则列宁是学院派，取消派，麻醉青年的祖宗，而盲马先生等是其不肖的灰孙子；某党是学院派，取消派，麻醉青年党，而盲马先生等是其叛逆的党徒。

只有自己所把握的不是真理，才不许他人过问真理。甘心不中用地去信仰非真理，甘心做非真理的奴隶，自己才不去理解真理。中世纪教权时代科学家的惨遭刑戮，就因为他们要冒犯非真理的权威，去探求真理。能说这些探求真理的科学家是麻醉青年吗？盲马先生的意见是与中世纪的宗教徒一样，“盲人骑瞎马”，只要行动不要理论的。

至于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不是要读者盲信我的主义，我是并没有主义来向读者标榜的，我只要读者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信得过的真理，如果青年们愿意相信真理，我这里就贡献一个探求真理的思考的方法。（也不是自己发明的）如果认为深思是麻醉，而马马虎虎不必深求，才不是麻醉，那自有“盲”人骑瞎“马”的先生们，勇敢地在这夜里奔飞，跟着去吧！

二

思想的方法等于农夫的耕具，用电的耕具比用蒸汽的耕具好，用蒸汽的耕具，比锄头镰刀好，用锄头镰刀比没有耕具好。所以没有方法去思想，不如用简单方法去思想，而简单的方法，自不如进步的方法。第一步让我们比较各种愚蠢的方法。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胡适之，介绍一种思想的方法，颇为风动一时。是不是最进步的方法呢？

胡适之的思想方法，也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杜威的。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使人不信用”。（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第四五四页）

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若用更简明的字写出来，便如下表：

- （一）疑难发生
- （二）指出疑点
- （三）假定
- （四）假定试用
- （五）证明

如果用他所举迷路的人的例来做说明，则：

“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同上第四五一页）是疑难的发生；

“怎样才能找出路呢？这是疑点；

爬上树顶去望望看，取出千里镜来四面远望，听听流水的声音，因为经验告诉他，人跟着水行必定可以寻一条出路，这是解决疑难的假定；

树顶上看不出出路，用千里镜也看不出出路，水声是听着了，这是疑难的试解；

跟着流水走，果然脱了险，这是证实。

这种思想的方法，就这样完成了。于是胡适之先生大致其赞叹之辞说：“懂得这个道理，便知道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单教人牢记AEIO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

在这里，让我们来考察杜威思维术是不是可以把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论理学推翻？是不是一个寻求真理的科学方法。

胡适之说：“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常三步的种种假设。”依我看来，第一步是不成问题的空话，王阳明格竹子也是由于不了解竹子而起。第二步也是不成问题的空话，“竹子为什么中空”是王阳明的疑点所在。这两步是问题的提出。

他又说：“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起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自然，登高可以望远，这是前人归纳而得出的经验，再演绎于现在所发生的事实。用望远镜，或巡流水找出路，并且第三四两步都是归纳演绎的应用。第五步是应用所得的结果。“所谓实验主义者”的“所谓科学方法”，虽然学孙行者翻斤斗，仍然翻不出“法式逻辑”的掌心。

如果胡适之发生‘死’的疑问，这是第一步，决定这个死的疑问这样提出：“什么是死？”这是第二步，根据经验眼睛闭着不出声是死，停止呼吸是死血脉不流通是死，这是第三步，然后去试看一个死人是否眼睛闭着不出声，是否停止呼吸……这是第四步，死人真是眼睛闭着不出声了，于是得了证实中之一，这是第五步。他日胡适之看见一个人睡着或生一种一时断绝呼吸的病，以为这个人是死了。这是真理吗？所以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的应用，有时还不如法式逻辑。

他们绝对看不出生与死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和矛盾发展中死的“突变。”生物在生存的时

候，细胞天天在新陈代谢中，即天天在生与死的变革中，矛盾发展到某一个时期，或中途遇有意外的障碍，生命的全部机能停止了，这就是一般人所看见的死。恩格斯说：生理学，如果不把死看作生的要点，如果不懂‘生命的否定’在本质上已经这样地包含于生命之中，……那么这种生理学，现在已经是不能称为‘科学的’了”那么杜威的科学方法论是不能简称为“科学的”了。

胡适之运用其非科学的科学方法论于中国政治上，于是而得出其“五鬼”论。“穿着西装礼服，挺着雪白的硬领衬衫”的劳工代表是他亲眼在美国看见的，纽约的高耸云霄的洋房！更是他所常见，所以他断定美国的强处就在富足，而在中国拉胡先生的包车的车夫没有晚餐礼服和雪白的硬领衬衫，那当然是中国闯入了贫穷之鬼。以至于其余的几鬼都是这样实验出来的。他绝不了解贫与富，疾病与健康等等之对立。他绝不了解美国地下工人和煤油大王之间的生活的悬殊。他绝不了解在这些世界中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怎样在发展他们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怎样在发展他们的矛盾。他绝不了解也绝不愿了解这些矛盾将怎样用突变——革命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非科学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只能引导假的思想入于迷途。

青年朋友们，你们不正在烦闷着吗？你们如果不要思考真理，最好跟着盲马先生走。你们如果不要方法去思考真理，最好跟着王阳明先生格竹子。你们如果不要“科学的”方法去寻求真理，最好跟着胡适之先生“一点一滴地去改造”，逐个的去打鬼。这篇文章不必看下去了。不然，我们再来继续的探求。

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是现在中学生所必需知道的常识。它有最高的三个定律，它根据这最高的三个定律，有各种推理的方式。在东洋古国的印度也有同样思考的工具叫做“因明”，在因明中有更烦琐的条文。

如果三个最高的定律——即常识中的常识，和真理是一致的，然后我们来考察烦琐方式。

三个最高的定律是：

- 1、甲是甲同 一律 (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 2、甲非非甲 矛盾律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 3、非甲即乙 排中律 (The principle of the Excluded middle)

这似乎是“自明真理”，用不着置疑。

我们举一首诗来考察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家时的父亲和“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呢？孩子们把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父亲认作客是否错误呢？根据这三条公式是很容易下判断的，

- 1、父亲就是父亲；（离家时的父亲就是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父亲。）
- 2、父亲非非父亲；（离家时的父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父亲，同时又非乡音未改鬓毛

衰的父亲；这样说法是不行的。即父亲是父亲，同时不能说是客。（客即“非父亲，词中所包含之一”）。

3、非父即客，非客即父。（不能或是父，或是非父，或是客，或是非客）。

客观的事实是这样吗？

从细胞的新陈代谢中就可以表明回家时的父亲已经不完全和离家时的父亲是一个人丁。“鬓毛衰”，就是一个显明的证据。这打破了父亲就是父亲的同一律。

细胞的新陈代谢在父亲的统一的身体中发展，所以回家时父亲与离家时的父亲相比较，父亲是同时包含了“是与非的并存”。这打破了父亲非非父亲的矛盾律。

回家时的父亲很显明的不是离家时的父亲，那么是“非父”了；而父亲又不是另外的一个人，那又是“非客”。所以他同时是“非父”又是“非客”。则排中律又不是客观的事实。

如果这方法应用到社会的发展，社会是渐进的便永远是渐进的，不能又是渐进的又是突变的。所以到了像“革命”这样的更复杂的问题在法式逻辑上更得不到解释。

因此，我们就必得介绍一个更高级更进步的思维方法了。

不过在这里不得特别说明的，上文所说，不是表示形式逻辑的完全陷于错误，形式逻辑的破产；是指明形式逻辑是不能在流动的，各方面，各种关系中去把握事象，它仅能把握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事象。所以我们不是要完全打破形式逻辑，而是要限制形式逻辑的绝对功用。

四

进步的高级的方法，是超乎一班人的思索之外而为一二超人所创造的吗？答案是适得其反，它会是寓在一切常识之中，而可以解决眼前的一切事物与道理，它从一班常识的思维与事理中发现之后，是非常近情面且易于理解，而且是许多人曾经不自觉地应用过的。如果他是超于人类的思维，那就不适合于人类；如果他是超于现实的事理，那就不足为发现客观真理的工具。

进步的高级的思维方法没有科学发明以前，也不知不觉中在各时代各地域各民族中运用着。

好像在中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个方式，在各方面，尤其在历史上已经运用得很普遍了。若我们整理一下，便可以化作如下公式。

久是通之延长，可以并合起来。穷之上省了一个通，补充起来，便是通，穷，变，通，穷，变。…

通——穷——变
||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
正——反——合

“穷”是否定了“通”，变又否定了穷，而得出新肯定。封建社会走到了末路，是封建社会的“穷”，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否定”。而在封建社会伏下了根的资本主义社会代之而兴，这是变，也就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合”。就是进到新的高级肯定了。

又举一个极平常的例，一粒谷，是“正”，谷种下去生出叶子，是否定了谷；最后结“实”是否定了叶子，就是否定了否定。这个过程，也就是通，穷，变的过程。种下去是—

粒谷，而结实则千百倍于原谷，所以它是向高级发展，不是循环。就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向上发展的，而不是循环的。穷，变，通，久在过去适用于历史上就成为治乱循环论，不是思维方法的错误，而是出发于唯心，及规律不完备的缘故。

在印度有更完备的唯心的高级思维方法。这个方法正和他们的“因明”相反。

好像大乘论者解释“般若”应用其所八不的方法。所谓“八不”是：

不生——不灭
不常——不断
不一——不异
不来——不出

般若

我们可以把这“八不”化为下列的公式：

不生——不灭

生——生之否定（=灭）——生之否定之否定（=灭之否定）

不常——不断

常——常之否定（=断）——常之否定之否定（=断之否定）

不一——不一

异——异之否定（=一）——异之否定之否定（=一之否定）

不来——不出

来——来之否定（=出）——来之否定之否定（=出之否定）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正——反——合

唯物的极致，不能不用这样的思维方法，唯心极致，也不能不用这样的思维方法。然而唯心的本身不是真理，即无论什么方法在他们的手中只有玄之又玄了。因为唯心者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则促其“观念”的发展，异想天开，几个否定之后，将否定而得出“画饼充饥”，将否定而得出“神游地府”，将否定而得出飞刀杀人，抑将否定而得出海市蜃楼，天亦不能约束他！

所以这个思维的方法，要和唯物论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真理。这就是所谓科学的辩证法。

科学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继承下来，而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运用的。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在根本上，不但与黑格尔不同，而且正与之相反。从黑格尔看来，思维——他并且把思维过程运用“理念”这个名称，变为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则不过形成思维过程的外部现象而已。至于我，是恰好相反的。观念世界，只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被移置被转置的物质世界而已。在黑格尔辩证法是倒立的。我们想在这种神秘的外衣之内，发见合理的核心，便不得不把他再颠倒过来”。（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采张栗原译文）。

辩证法在黑格尔是隐蔽在神秘的外衣里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论的神秘的外衣中采取合理的核心——辩证法，而移植于极坚固的基础上。于是形成这最高级最进步的思维方法。中国和印度虽然辩证法也发生了萌芽，但因为沒有唯物论产生，所以这科学的思维法不能完成。而唯物论的不早产生于中国和印度，则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工具不早发明于中国和印

度，于是中国和印度便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故。

让我们在这里郑重的提出唯物辩证法的方式：

正 These

反 Antithese

合 Gynthese

These在中国文很难找一个适当的文字去翻译，它是代表一个事物的意思。Anti是反对一个事物的意思。这三个字是源出于拉丁文。在德文中还有三个常用的名词：（参看李季我的生平四〇八页）

Positive 肯定

Negation 否定

Negation der Negation 否定之否定

我们就三方面来证明这个方法的正确：

1、自然发展的辩证法；

2、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3、思维发展的辩证法。

在自然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举下例为证。

正——蝶

反——产卵后蝶死

合——卵成多数之蝶

社会发展之例：

正——中国古代以井田制度分配土地

反——井田桎梏生产

合——毁井田，兴阡陌，地主私有制成立。

正——地主生产

反——地主对佃农雇农压榨，农具耕地不改良，桎梏生产。

合——土地革命由土地归耕者所有到（高级的）土地公有。

注：在这里对于井田制度的引用，并非承认中国曾有载在经典式的完备的井田制度。仅借用“井田”以表示原始的土地公有而已。

恩格斯说“头脑的辩证法，不外是现实世界即自然与历史之运动形态的反映。”思维不能独立，思维不过是现实世界（自然与历史）运动形态的反映，现实世界的发展是辩证的，思维自然是辩证的。所以“辩证法应被看作是任何运动的一般法则之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法则，不但适用于物质世界及人类历史领域上的运动，而且还适用于思维的运动。”

（恩格斯《自然的辩证法》神州国光社有杜畏之译本）

辩证法没有特殊的规律，因为它不是呆板的公式，而是实际世界与思维的动的发展。为着便利了解起见，根据列宁所提出的四项规律加以说明。

1、从各方面各种联系上去研究，在这句话中应当分作两段解释：第一，研究一个事物，应当从各方面去研究，即应当从全体去研究，不应当仅仅把握其一面与片段。第二，应当从各种联系上去研究，不应当从孤立的事象去把握。好像研究现在中国经济性质，如果专从孤立的去研究，绝对解决不了。专从剥削关系的一面去解答中国经济问题，于是许多人就得出封建社会的答案。专从生产工具去解答中国经济问题，若只看到农村的一方面，必

定冒然的肯定其为封建社会；若只看到都市的一方面，必定冒然的肯定其为资本主义社会。若要得到正确的结论，必得第一，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了中国的都市；第二，把握城市与乡村的联系，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支配地位；第三，必得把握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联系，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较之民族资本占绝对的优势。能这样从各方面“各种联系中来把握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然后可以确定中国是半殖民地性资本主义社会。（参看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拙著中国现阶段经济性质之解剖）

2、从其变更及发展中去研究，这里，我们分开三段来说明：第一，从其变更去研究；第二，从流动发展中去研究；第三，从矛盾发展中去研究。

第一，辩证法最重要的一点，是由量到质的突变。辩证法所以是革命哲学的根据就在这里。“突变”在旁的不变简单的思维里面是找不出来的，所以他们否认突变，否认革命。从胡适之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中得出一点一滴的改良论，只能得出中国的五鬼作祟论，因为他不能从全面去观察，他不能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联系去观察，所以他得出五鬼论，即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因为他否认突变，所以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但事实是明白摆出在那里，达尔文在客观事实的搜求，指出了许多突变的事物。他并没有应用辩证法，并不是辩证法弄的虚玄。一个很显明的例，水到冰点变成冰，并非由液体变成胶质然后逐渐地凝固，而是冷到成冰的程度，突然地变成固体。水热到化汽点，化成蒸汽，也不是由水化成水蒸汽中间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化成汽，是突然蓬勃地上升。这叫做突变。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国大革命是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中的突变，俄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中的突变。不是用和平的调协的方法逐渐地由这个社会转移到那个社会。

冰逐渐地加热，是热的量的增加；水逐渐地加热，也是热的量的增加。冰融解成水，水异化成气，是质的变化。这种突变是由量到质的变化。由一个社会转变到另一个社会，也是由量到质的变化。仅懂得一点一滴的进化的人们是仅能从数量上来了解问题，而不能由量到质的变化上来了解问题的。这是机械的不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与实际的动的世界密合无间的方法。

第二，我们要“从流动的发展中去研究”。客观的世界——自然与社会，是天天在流动中发展的。如果要假定有静的事物去了解，那是法式逻辑的任务。辩证法是要在发展中去把握事物的。就像前举“少小离乡老大回”的诗为例，这位离乡的父亲是天天在变动中发展，而不是自少到老，一切思想，形貌都保持着一个原样子，“儿童”之“笑问客从何处来”就因为不能在流动中去认识他的父亲的缘故。

第三，我们要“从矛盾的发展中去研究”。机械论的思想方式是：

是——是

否——否

而辩证唯物论者的思维途径却是：

是——否

否——是

封建社会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封建社会而兴，不是突然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而是在封建社会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逐渐壮大，终至于破胎而出。于是发生突变。好像妇人怀胎一样，假使不了解矛盾的发展则容易陷于唯心论。好

像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写信来说，美国不容易发生革命，因为美国的阶级是表现得不如中国明显，中国人每月一百元的收入者和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者衣服就穿得不同，美国人几乎很难看见定制衣服的，都是从一个公司里买。一个公司每年很科学的供给全国大小长短的人的衣服，每月几万元的收入者和每月几十百元的收入所穿的衣服没有多大分别。他在这里没有看见矛盾。几乎全国每一个人的衣服都取给于一个公司。而这公司是在资本家手里。正是社会主义胎儿已经充分的壮大的证明，矛盾的封立已经尖锐到快要由量到质的突变发生的证明。

3、从实际的环境中去研究，辩证法不是离开实际的抽象的公式，所以不能将一公式抽象的演绎于一个实际环境，而要求其适合。美国留学生不能把从美国学来的资产阶级公式适用于中国社会，苏俄留学生将从苏俄学来的革命方式。生吞活剥的移植在中国的国土上，是和资产阶级学者所犯的错误的没有两样，因为他们同是唯心的。

4、从其与人的实践上的联系上去研究。人类不但为环境所影响，并且能影响环境。不过影响环境是有限度的，我们能用温室使桃花早开，我们却不能使桃树开芙蓉花。我们促进社会的变革，但不能自由的操纵社会的变革。明白些说，就是人类如果把握住社会动向的时候，就其动向而影响之，促进之，这是可能的事。不能把握住社会动向时，像盲马先生辈盲动一辈子也不能促进革命。

同时，思想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深思不能离开苦学。应当从古人的经验堆积中去苦学，应当从自己行动的实践上去苦学，然后才能获得真理。实践与思维是互相密切地联系着的，这里，让我们覆诵列宁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一九三二，三，一七。

此文仍续继《苦学与深思》篇，用漫谈式写成。读者欲深究辩证法，可读李季先生《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将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本期《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占的位置》，即该杂志的一部分。

（《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一四，一九三二年出版）

两个思想方法的对照

海格尔历史哲学概论译序

王 灵 皋

王礼锡先生在她主编的《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那一期（第四五期合刊）上，有这样一段话：

“自帝国主义的外力在中国社会发生作用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两个激烈的战争——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个过去了，一个正在造着馆林弹雨的混战。

这两个论战的接踵而来，是表示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迅疾。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不同点，认识这两个论战在经济的变革上是什么意义。

一，人生观论战，一方是科学，对手方是玄学，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这两个对手方都不存在，因为到现在科学已成为常识的‘真’，玄学已成为常识的‘幻’。

二，在哲学的观点上，人生观论战，一方是极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极端的唯物（圈点是我加的。灵皋）；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斗争，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

三，人生观论战是以普遍的真理为研究的对象，各有可根据的现成的理论；中国社会论战是以中国的实际的动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没有可抄袭的蓝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观论战一方面是以形式逻辑做武器，（虽然他们也以形式逻辑为不足，但终跳不出形式逻辑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圈点是我加的。灵皋）——《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页五一六。我劈头引了王先生的一大段文章，好象令人摸不着头脑，而且与介绍海格尔的历史哲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因为王先生这一大段文章中包含着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在与我要介绍的海格尔的《历史哲学》及我所要在本文论证的哲学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提出来说一说：

王先生说：“现在科学已成为常识的‘真’，玄学已成为常识的‘幻’。”这话恐怕是王先生一时的快意之谈。所谓常识，自然是寻常人的知识，即普通一般人的知识，就是说，现在中国人，至少是知识界，青年界都知道科学为真，玄学为幻，都知道注重科学，鄙弃玄学，都知道利用科学，不致再被玄学鬼所迷，实在说来，中国思想界，青年界能以真正了解科学与玄学的区别，再进一步明了科学与玄学在西洋思想界的关系（以前的和现在的）恐怕是不怎么样多，常识更可想而知，资产阶级在他攻击封建制度和此种制度之上的建筑物，哲学，文艺等等的时候，对于玄学自然激烈地批评，对于科学自然尽量地利用。然而一到了政权在手，他要维持他的阶级利益；玄学又变成他麻醉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一个最有效的毒剂。所以欧洲所谓文明国家，一方面，他的科学保管发达，一日千里，一方面，他的玄学仍然有他的坚固的合法的地盘，各大学中都有他的寄生处，此柏格森所以有名于巴黎，而杜里舒所以驰声于德国。就以个人而论，杜里舒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个玄学家，这正是十足地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尽量地利用科学，因为他本身包含着极大的矛盾，玄学鬼与他相终始的。至于中国，还早着呢！统治阶级正在高唱他的“尊孔”（何键），“礼佛”（戴季陶），提倡忠孝节义，以及所谓东方文明，距真正普遍地利用科学（即到常识知其为‘幻’的程度）真不啻十万八千里，统治阶级是永远不会尽量地利用科学的。就因为他需要利用玄学这是一。

王先生说：“在哲学观点上，人生观论战，一方是极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极端的唯物。”这话是对的，但是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斗争，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这话就有商量的余地了，因为我们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就碰到了唯心论的余孽，你看：

“这一个战斗的后台指挥者，是存于现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而为着各阶级的畸左畸右，形成许多不同的意见”（拙著序幕）读者要接受或反对这许多不同的意见，必得先置身于作者的阶级意识中去切实理解其试解的意义，然后跳出其阶级意识的牢笼之外，加以纯客观的体认，然后才不褻淡，然后才可得到有价值的批判……

我们既以“置身于作者的阶级意识中去切实理解其试解的意义”，那已经是一种“客观的体认”，为何又“跳出其阶级意识的牢笼之外”？既“跳出其阶级意识的牢笼之外”，又怎样

“加以纯客观的体认”？除非“跳出其……的‘其’字。是指读者而言，才有意义，然而这末一来，前后又成倒置，因为只有先“跳出”自己的阶级意识，然后才能置身于作者的阶级意识。而且要想切实理解一作者的试解的意义，不但要明了作者的阶级意识并且读者自身的阶级立场也要异常坚定，才能充分获得客观的体认。王先生这种说法，不但有点唯心的（主观的）倾向，并且有点混乱的情形，几乎不能令人理解。这还不算，或则可以说是我故意地周纳，现在我再设一个问题，假使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的结论一方面的主张是“是”，那末，另一方面的主张一定是“非”了，是的方面定然是客观的，唯物的，那末，非的方面恐怕就有主观的，唯心的危险了。而且既然说我们要读者置身于他们作者的阶级意识中，那他们作者的文章都是由他们各阶级的不同的意识出发，就是各其主观的见解出发，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暴出他们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唯心的而非唯物的倾向吗？他们并未曾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史的真实现象，只不过各由其阶级的主观立场出发而描写他们各人一相情愿的中国社会史罢了，这是研究王先生的说法之必然的结论，这是二。

王先生说：“人生观论战一方面以形式逻辑做武器，一方面是以玄学做武器”，就当时他们论战的情形说是对的，因为玄学派的大将张君劢以为“人生者，变也，活动也，自由也，创造也。……试问论理学上之三大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说其合不合乎？论理学上之两大方法（曰内纳，曰外绎）何者能推定其前后之相生乎？”（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其实逻辑的推论，谁也不能完全摆脱，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且张君劢虽然说是“人生观不为论理方法与因果律所支配”，然而他又说：“夫事之可以预测者，必为因果律所支配者也”，“人类目的，屡变不已；然据既往以测将来，可以深信而不疑”这岂不是顶刮刮地逻辑推论么？无怪乎胡适之（所谓科学派的论战领袖之一）奚落他“始终不曾脱离逻辑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宝——矛盾律——的笼罩！哈！哈！”至于胡适辈虽然以科学反对玄学自豪，然而形式逻辑终久跳不出唯心论的圈子（因为实验主义讲到哲学根本问题，它就要碰壁，要陷到玄学的泥淖之中，此是后话，暂且不提）。至于王先生说，“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是以唯物辩证法做武器”，那就未免太牵强了，太危险了，因为这句话的本身就犯了“形式逻辑”的毛病；王先生只看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人口头上都在喊叫唯物辩证法，而不考察他们争辩的内容与唯物辩证法和阶级的关系，遂把唯物辩证法，看做一种乡愿似的，以为人人可以利用他做武器，实在错了。自从一九一七年以后，世界革命潮流的震动、摇荡了全人类的心灵，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这一思想方法，也就跟着革命狂潮，掀起全人类思想界的注意，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以唯物辩证法相号召，这是一个事实，甚至各派理论家无论他主观上愿与不愿或能与不能，都莫不挂着唯物辩证法的幌子，以博读者的欢心。但是，实际上，究有几人能以而且愿意真正了解，能以而且愿意真正运用，实在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承认这一事实。就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随处碰见这样的事实证明，他们笔下，口头自然都挂着唯物辩证法的招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譬如，孙倬章先生所郑重取材的任曙先生的《中国经济研究》，就是一个好例；孙先生说：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轮船足以代表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而中国历年的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为八五与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则为九八与二之比（自注：见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0）。可见资本主义摧毁封建经济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势力，只残留百分之二，几已达于零点了。我们又以钱庄代表封建经济，银行代表资本主义，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钱庄与银行投资资本的百分数，一九一二年为六八与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则为三七与六三之比（自

注同上书，P141) ”一页八一九。

这在表面上，即从形式逻辑的推论法看来，“帆船”自然是“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轮船”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帆船出入全国的吨数百分比之轮船出入全国的百分数仅仅占到百分之二，那末自然是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封建经济几“等于零点了”。从形式逻辑的推论法看来，“钱庄”自然又是“代表封建经济”，“银行”自然是“代表资本主义”的经济；钱庄的每年投资的百分数比之银行每年投资的百分数，既然只占百分之三七，“封建势力几零落了一半”，那也可以论资本主义占着压倒的优势了，不错，是的，然而只不过说了一半的真理；因为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中，不但轮船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的交通工具。即号称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也变成资本主义商品流入内地或从内地吸收原料品的补助工具，不但银行是资本主义投资的机关，即凤称封建经济的钱庄，亦将变成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伸入内地和□□的最有效力的工具。又如朱新繁先生和陶希圣先生讨论“中国封建制度究于何时开始破坏的呢？”这一问题时，自己答道：

“……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封建制度虽然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已经开始破坏，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主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史论战号，《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

注意！一个辩证法的研究者，首先要注意量与质的问题，既名曰残余，就不得说占某一物体或某势力之大部分，只能说是一小部分，退一百步说，也必须承认这一常识所能做的推论，既是只能算是一小部分，那他在所处的环境中就占不了优势，这也是形式逻辑的ABC所能知，不必诉之辩证法。然而朱先生竟然说是“残余”“占”了“优势”，不但为唯物的辩证法所不容，亦且为形式逻辑所不许，我们且看马克思怎样说：

“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社会状态的内部，即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为资本主义的观念所支配。”(Karl Marx *Vas Kapital*, Dritter Band, erster Teil, Seite 14)

为什么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为资本主义观念所支配呢？自然是他的生活的链子已经操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机轮中，在这里，就是说，虽然是封建经济的钱庄与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的帆船，但是现在它的命运却完全操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的银行与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的轮船运行中。明白这一点，那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的结论究为谁属？即现在的中国社会果为资本主义占优势呢，还是封建势力占优势这一问题，当可迎刃而解。这样，才是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这样，才是真是拿“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不然的话，那只可说是“唯物”，而不能说是“唯物的辩证法”，仅仅唯物，还不免要走到唯心论的歧途啊！这是三。

推论王先生的意思，必然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唯心与唯物之争，都已成为过去，都已成为陈腐的问题。其实不然；唯心与唯物之争是哲学史上自古及今光景常新的问题，假使社会制度还滞留在阶级制度的里面的话，因为一部哲学史的思想斗争，就是人类历史的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注)阶级社会存在一日，唯心与唯物的理论斗争就存在一日；唯心唯物之理论的斗争

(注)墨休说：“哲学是各种阶级斗争的一种逻辑之随带的现象；一种人米在其中意识此等斗争并做这种斗争的决门的逻辑的形式(ideologisches Formen)，什么时候不发生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就不决会发生斗争，并且阶级斗争一旦消灭，哲学也就马上不再保有这个字的意义的意义……”(Fraun Mehrin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Zur Einführung, Seite 25.)

一旦存在，则这种问题就不是陈腐的问题。乌里耶诺夫（Uljjanow）说：

“唯心论与唯物论在哲学的发展之两千年的斗争可以成为陈腐的？哲学中的柏拉图与德模克勒特的倾向或方向的斗争可以成为陈腐的？宗教与科学间的斗争可以成为陈腐的？客观真理的否定和它的承认可以成为陈腐的？超感觉的知识的信徒与其敌方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陈腐的？物质概念之应当承认或是应当否认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于他的感觉机关的启示应否信赖的问题，是我们的认识之源的问题，是从哲学的最初就要定立和考察的问题，是一个可以为魔术师的哲学家们几千遍粉饰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之不能成为陈腐和视觉、触觉与嗅觉为人类之认识的源泉的问题之不能成为陈腐是一样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德文译本页117—118）

就是说，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现在还是新鲜而迫切的问题，不能视为陈腐而忽视之。不错，唯物论，固然资产阶级也有个时间是需要的，然而彻底地主张唯物论，彻底地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从事于思想的斗争，那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至于唯物的辩证法那就更非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不能彻底地主张和应用，也不敢彻底地主张和应用王先生说，“……这一战斗（即中国社会史论战。灵皋）的后台的指挥者，是存在于现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都能用“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都敢用“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不能不说是王先生的创见，果真中国的资产阶级能用和敢用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那马克思下面的一段话就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说：

“神秘形态辩证法，是德国的流行品，因为他在外观上好象变成继续现状似的。它在它的合理的姿态中，对于资产阶级与他的理论上的发言人，是一种恼怒和恐怖，因为它在它的存续的积极理解中，同时也就包孕着这种存续的否定的理解，包孕着他的必然的没落的理解，因而也就是依着它的生灭无常的方面，把握它在运动之流中的每一形态，它自己毫无所畏，照着他的本质是批评的并且是革命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所以资产阶级对于辩证法是不能而且不敢领教的，尤其是在他既得政权以后，而且即就无产阶级的阵营里的思想家说，也不是人人都使用这种唯物的辩证法，或是使用得无遗憾的；布哈林是苏联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家，然而列宁在其遗嘱中尚谆谆地说他不懂得辩证法。波格达

• 此“故实读者可参阅博克老夫斯基、石川一郎著的讲义我国革命全史第十三章列宁与布哈林关于“波勒斯特和约”的争议，就可看出布哈林只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推论家，他不懂得辩证法之实际的使用；去年神州出版的动力杂志某君曾讨论布氏的机械的唯物论，本年读书杂志海格尔百年祭专号上载刘君镜园一文，也曾论到布哈林关于国际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之违反辩证法的地方，读者均可参考。我们再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提出了他的有名的四月大纲，引起加米诺夫反对。加米诺夫认定将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列宁则主张将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这也表现加米诺夫不懂得社会和历史的流动中的辩证法的转变，列宁说得对：

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大破坏时期，所以就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因此俄国所发生的革命，只是第一个革命，一定还有其他各国——如英、法、美——发生同样的革命，这只能叫做第一个革命。甚么叫做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二月革命决不能因此就暂告停滞，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还要继续发展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二月革命是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他一定还要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同前书页三）（至三——）又说：“布尔什维克党与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机会主义者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截然的分开，中间好像隔着一座万里长城，布尔什维克是否认这种理论的。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然要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圈点是我加的。灵皋），无产阶级革命确是由资产阶级革命之彻底胜利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必先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必要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和平的发展，才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就不是这样，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关于口口，无产阶级就可以起来领导革命，以走到革命的彻底胜利。既无然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占

据了广大劳苦群众之最高的领导地位，则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和平的发展。（同上书页三一七）

诺夫为俄国积学之士，列宁还严斥其对于唯物论及辩证法无所知（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优越的革命思想家，但列宁与她争论关于阶级斗争的战术时，尚再三致意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各个特殊的历史的情势之具体的分析”（参看张其振的理论与实践》页三七〇）法国革命史（注一）的著者布洛尔（Nikolaus Bloch 1849—1927）有人还说他的法国革命史与德国革命史未曾把握到历史的唯物论，（注二）可见使用唯物的辩证法的武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先生的“各阶级”都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这种说话，似乎未免离事实太远了，我们中国的学术界的进步，近来自然有很快的进步，然而我们应该坦白地虚心承认，我们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还很低，勇猛精进，疾起直追，固然是研究者的应有美德，然而夸大而不切事实，也就表现我们的钻研的肤浅。我们承认：唯物的辩证法是我们思想斗争的唯一的武器，不过这一武器不是各阶级都能利用的，只有无产阶级可以尽量地利用它；不是人人都能利用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阵营中有数的伟大的思想家，才可以尽量地利用它（这自然是就目前的文化程度而言）。我们当前的责任是在：一方面努力研究唯物论的辩证法的理论，并且是要用眼前新鲜活泼的事实做参考去研究它；一方面努力介绍这种学说给中国一般青年。但是要深切地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若果不精研海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法，目的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于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诸氏的唯物论的辩证法精义（参看《辩证法经典》，亚东版）以后，即决定从事于海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法的著作的介绍，去年夏天开始译述海氏的历史哲学概论，六月而毕，并作是序一篇叙述海氏之学与马克思之异同，兼答胡适先生对于辩证法的批评，本打算早些发表，因为我的朋友李季先生其时正在写他的“我的生平”一书，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我们的方法是相同的，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也有许多相同的，如达尔文主义，如实验主义等等，他的读书之勤，用力之专，连想之深，均为朋辈中所仅有，我要等待读了他的大著，方行问世，现在他的书出版了，对于我所讨论的问题，实有不少的指示，而本篇关于实验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就是取材于李先生此书的，下面就是我去年做的“海格尔历史哲学概论”的序言。

二

海格尔(Hegel)的历史哲学概论，原名“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注）为他的世界历史哲学讲义，原名“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的序论，本文就是它的译本的序言，但是为什么又叫做“两个思想方法的对照”呢？这却有一个原因。

（注）海格尔（Ge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晚年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讲稿未及付印而卒。

原来我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多少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犹之乎在清季光宣之交，我们

（注一）布氏的《法国革命史》已由李季先生译出，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两三年矣。此书虽非异常杰出之作，然就我们所知道的叙述法国大革命著作看来，除了克鲁泡得金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可以与之比肩的。至于李季先生译笔忠实原作，尤为“常识”所知，还是值得我们郑重介绍的。

（注二）W. I. Lenin, Zitr. Vertheidigung des Hingegenstehenden Materialismus 页二、三，注一。

之濡染于种族革命，所谓“排满灭清”的思想一样。记得，我在中学校（十三四年前后）教国文时，我就牢记着胡适之所提出的一条新生活的科学方法：

“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问得出一个‘为什么’。（《胡适文存》卷四，一四九页）。这的确是个新生活的很有效用的方法，我随时随地拿着这个方法去求学和做人，有趣到还有趣，却时常令我陷于迷离恍恍之境，不知所从，譬如我问：

1，中俄的中东路问题，中国先向苏联挑衅，引起中俄冲突，中国败了，苏俄便适可而止，并没侵略中国尺寸土地和丝毫权利。“为什么”中国要向苏联寻衅呢？“为什么”中国打败仗呢？“为什么”苏联既然获胜之后，不向前进攻呢？“为什么”不要求特别权利，乘机占领中国土地呢？

2，日本这次进兵占领沈阳，是衅自彼开，中国方面未尝有半点不是，却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为什么呢？人家既无端地打上门来，而我们负有守土之责的边疆大吏，除了马占山外，丝毫不加抵抗，四省地地，拱手让人，为什么呢？

3，我们中国的军队自相攻打为什么那样勇敢？又为什么同苏联打了一仗就弃甲曳兵而逃呢？但是同俄国还打一仗，对于日本的进攻，又为什么竟“夹尾巴狗”似的，闻风而逃，更其名曰“不抵抗主义”呢？

这些极其相似而又绝不相侔的问题，稍有知识的中国人都应该把它放在心头想一想，但是我想他们一定得不到满意的解决，胡适先生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注），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一定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问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于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生活问题，不但要问它“为什么？”并且要先问问它

“是什么？”譬如，你在吃饭，我问你“为什么”要吃饭，你一定冲口而出地答道：“肚子饿了，所以要吃饭。”假使我再要问“肚子为什么饿呢”或是“饭吃下去，为什么肚子就不会饿呢？”那你一定觉得有点麻烦了，因为，这必得要根据生理学和化学上的知识，第一步要解释肚子是什么物质构成的，第二步要解释肚子里面是些什么器官，什么构造，它与全身各部有什么关系，它需要“什么”东西做营养，某种食物是些“什么”物质，它含有“什么”样的滋料，对于人生各部有“什么”作用；第三步要解释，吃了这些东西，肚子里面会起“什么”作用，不吃这些东西，又会有“什么”变化。这些“什么是”或“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为什么”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又如，我们老早就怀疑国际联盟，嘲笑国际联盟攻击国际联盟，胡适先生一辈人则希望国际联盟（大多数的高等华人都希望国际联盟）幸而我们排难解纷，制止日本的侵略。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胡适先生等又为什么要希望，皆是因为我们对于“国际联盟是什么东西”这一问题的解释不同。古人说得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要问她为什么 not 拜姑嫜，就要“妾身分明”，这就是“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自然不会“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吃力不讨好。

我们读书，尤其是读胡先生的书，通统应该用这种方法。对于胡先生的著作所发生的“是什么”或“什么是……”这一类的问题，简直不知其数。最使我怀疑莫决的是胡先生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字，尤其是其中的一段话，如下：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

（注）当日帝国主义强占沈阳之后，上海张载熙通在北平发表言论，谓日本此次出兵必不能成功，因为日本其一派资本家赞成和其一派资本家反对云云，胡先生对此并不明白，至少是不愿意明白这一大事中是“什么”和“日本资本家又是什么东西”。